

简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过程

杨继顺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 陕西咸阳 721082)

摘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一概念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重要地位,是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格局的一把钥匙。该理论深受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影响,是对派克、布朗、迪尔凯姆等人思想的扬弃,也是对中国文化结构、民族构成及其历史源流和社会结构的重新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过程,伴随着费孝通先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基本历程,对此历程的梳理,有助于加深对该理论的认识,也是当前民族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

关键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形成过程

中国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4)03-0092-05

1988年,费孝通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作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多元起源、复杂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多元”和“一体”的结构关系等等,^[1]标志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理论的正式提出。次年,经修改的演讲文稿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后收入《费孝通文集》第11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费孝通先生多年从事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该理论对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的学科建设、内涵发展和理论自觉,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体现了中华民族从分散的“多元”逐

步形成集中的“一体”的历史进程。而阐释这一历史进程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体现了费孝通先生长期从事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该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则是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民族学、民族史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

对于集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大成的费孝通先生而言,这些学科理论在他早期的学习、研究和思考中是浑然一体的。他认为“这三个不同名称的学科,实际上有着共同的领域”,而他“专攻的这一

[收稿日期]2014-01-11

[作者简介]杨继顺(1985-),男,苗族,云南武定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

部分对象正是这三个不同名称的学科的共同领域。”“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份不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我并没有因为学科名称的改变,而改变我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我的研究工作也明显的具有它的一贯性。”^[2]从费孝通先生的求学和治学经历来看,他的学术理论具有共同的渊源,都深受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影响,同时明显地具有本土化特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费孝通早期社会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一样,受到相同影响,其饱含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来源于马林诺夫斯基,同时也明显有受派克、布朗、迪尔凯姆等人影响的痕迹,这种影响并非对他们思想的简单组合,而是在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结构、民族构成及其历史源流和社会结构的过程中,经过扬弃,形成自己的思想的。追根溯源,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受到社会学初创时期的孔德、斯宾塞所提出的“社会是具有生命的有机体”思想的影响,并且与迪尔凯姆强调社会是一个结构功能统一的整体思想一脉相承。^[3]斯氏社会有机体学说不但包含了社会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部分组成的系统这一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假设,而且他首次提出了结构、功能、分化、同质性和异质性、功能相互依赖等,后来成为结构功能主义核心范畴的概念都影响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与扩展。

迪尔凯姆着重强调社会的整体性质,认为社会整体层次的需求必须通过其内部组成部分的互动来满足。迪氏认为,“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产生这一现象的缘故,而他的功能则“应该永远到它与某一社会目的的关系之中去寻找”。^[4]^[P125]在认识社会结构过程中,费孝通对马林诺夫斯基生物有机体论有所批评,但他进一步强调迪氏只看到社会的平面结构而忽视社会的立体性,费氏认为社会是一个无限继替的过程。在考察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结构的影响中,费孝通认识到“中国的整体观念是垂直的,世代的,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个体是一个将过去和将来连接起来的角色”。^[5]^[P42]因此,他将社会看作是立体的结构。这一思路对他从事民族学研究,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费孝通说自己和马林诺夫斯基在相见之前“已有了共同的语言”,“那时我才明白我从史禄国那里学来的这些东西,着重人的生物基础和社会结构整体论和系统论,原来就是马氏的功能论的组成部分。”^[6]^[P472]师从马林诺夫斯基之前,费孝通已经对人类学有所涉猎,体现在他写于1933年的《人类学几大派——功能学派之地位》一文中。该文对西方人类学诸学派、特别是功能学派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在师从马氏的过程中,他学习吸收了迪尔凯姆和布朗等人的功能观点,结合自己在国内实地调查的体会,形成了自己具有本土化色彩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雏形。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进一步发展了迪尔凯姆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马氏一反传统人类学中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是有利于满足某种需求的,而这种满足对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马氏主张对人类事实进行全面的分析,明确所观察的事实完整的文化体系中的位置,注重文化体系内各子系统之间,以及文化体系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直接影响到费孝通研究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结构。

派克、布朗介绍了研究者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观察和体验的实地调查方法,这让费孝通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很大改变。1932年,派克受燕京大学邀请为社会学系授课,费孝通不但听了派克的课程,还深受他研究方法的影响,派克“领着他们跳出了未名湖畔狭小的生活圈子,进入到真实、生动、丰富的社会实际生活当中”。^[7]^[P69]派克此行无疑对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产生了一个刺激,正如费孝通当时所说的,“他所给予人们的不是普通的知识而是生命,一种能用以行动的知识。”^[8]^[P125]费孝通后来说:“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我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而派克的言论对他震撼很大,“这一震动,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其后几十年里的学术生活,说不定多少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前进的道路。”^[9]^[P214-215]

因之,笔者试做如下归纳:吴文藻的社会学“本土化”为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标定了学术方向,使得该理论一直是在本土化情怀中孕育、诞生和发展。作为最早提倡社会学本土化的学者,吴文藻身体力行地践行社会学本土化,对费

孝通影响极大。这一理论的提出,正是在广泛的少数民族历史社会调查基础之上,掌握了大量的、活生生的一手资料,并对中国民族的历史及其构成展开理论思维的结果。派克来华讲学,开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运用学科方法,大兴调查之风的滥觞。史禄国体质人类学的训练赋予了费孝通进一步研究少数民族,为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本领。在大瑶山调查,对花篮瑶的研究,以及随后的“江村”、“禄村”调查,甚至参与建国后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史禄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思想则为他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注入新动力,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领会,为他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供了根本视角。

二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目前已普遍为学术界所接受,然就此格局的形成过程而言,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马戎、陈连开等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林惠祥等认为经历了四个阶段,孙进己等认为经历了六个阶段^[10],王钟翰等认为经历了七个阶段,王桐龄等甚至认为经历了八阶段。^[11]纵观这些阶段划分既是民族史研究的划分期,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时期划分。然则,大家都承认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始终有一个主体或者主干,而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互动,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推动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

从春秋末期到秦统一以前,是我国各民族交流互动最频繁的时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秦统一以后到南北朝分裂之前这一时期,松散的多民族国家在统一中央集权政府的强大推动下,发展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部分民族政权从藩属变为地方政权。^[12]南北朝到唐末,是经过大分裂后再一次民族融合的高峰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再次屹立。五代开始到元朝结束,又是一次民族纷争、民族融合的高潮期,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清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但是随着国力的衰落,外辱愈甚,而民族

向心力加强。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面临亡国灭种,山河易色的危机,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达到最大、最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应运而生。

费孝通先生对民族学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至少始于1933年以前,是年他作《亲迎婚俗之研究》一文,利用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视角,通过梳理大量地方志对亲迎这一婚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同年,他写了《人类学几大派——功能学派之地位》、《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社会学家派克论中国》及书评《〈野蛮人之性生活〉书后》。表明他已经开始接触并使用功能主义的方法,同时开始关注社会实际。随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俄国人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1935年毕业后在史氏安排下,携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计划从事为期一年的少数民族调查。

大瑶山调查是费孝通从事民族学实践“行行重行行”的起点,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具有潜在的影响。关于1935年开始的瑶山调查,费孝通在《桂行通讯》中有记载,后因惨遭变故而中断。这期间对花篮瑶的调查,后来写成《花篮瑶社会组织》,在吴江养伤期间对“江村”的调查,以及到达伦敦后寄回国内的《伦市寄言》中,都不自觉地、越来越多地受马氏功能主义的影响。费孝通说,“无疑的我们要坚持我们‘到实地去’的纲领。……我们在‘功能’之外尤需加一个‘比较’的观点。……而且在引用比较方法时,我们可以逐渐介绍国外社区研究的结果。”^{[8](P400)}

如前所言,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在费孝通的学习思考和研究中是浑然一体的。1938年,费孝通以《江村经济》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回国并辗转至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开始学术实践,他在昆明呈贡的“魁阁”组织并亲自深入到农村做社会调查。这一段写成的《禄村农田》,作为《江村经济》的姊妹篇,是对功能主义理论的全面运用,紧接着写成的《乡土中国》,则是从理论角度,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入思考,功能主义思想一以贯之。课余的社会调查,使费孝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次年,他在昆明《益世报》上撰文,参与讨论过中华民族“一”和“多”的结构关系,这可被看作是他多年以后

提出“多元一体”理论的重要伏笔。

1950—1952年,费孝通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先后赴广西、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政策,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历史和现况等作了深刻的了解。在《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兄弟民族在贵州》及《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思考》等文章中,他清醒地看到,民族关系复杂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历史的、长期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必须要承认“民族区别”,“进行部分的改革”。^{[13](P29)}这一时期开展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酝酿时期。

调中央民族学院后,费孝通曾讲授“民族历史概论”等课程,他试图从民族的角度重新陈述中国历史。从1953年起,费孝通参与了“民族识别”工作,前赴贵州省开展民族识别调查与研究。此项工作使中国民族学具备了比国外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更为强烈的“族体”意识,在后来很长一个时期内,既是中国民族学的重要特点,但也成为它的局限性之一。^{[14](P126-127)}随后,费孝通参加了由全国人大组织实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并在其中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这期间,费孝通多次前往贵州、云南等地,一方面深入进行实地调查,一方面积极思考涉及民族问题的各种理论问题。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民族学和民族关系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料基础和学术实践依据。费孝通与林耀华合写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可作一例,该文分别从少数民族的族别问题、社会性质、文化和生活以及宗教信仰等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国民族学的基本课题。^{[13](P229-258)}文章辨析了“民族”的概念,反映出当时学术界对中国多民族社会的复杂性和各民族之间界限的暧昧性已有所认识。^[15]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

恢复学术活动后,费孝通立即重新投入已中断多年的民族调查和民族理论研究,随即发表了《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对构成中国民族政策之根本基础的“民族识别”,从学术的立场给予了全面地总结,其中提到了中国多民族社会的特点。^[16]费孝通旋即非常明确地谈到中国各民族不仅创造和发展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组织和文化,

还通过彼此的交流、融合、分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等,共同缔造了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整体“中华民族”。^{[17](P188-210)}这一时期,他开始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认为这是相对于整体的局部性和特殊性。费孝通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成功,正是由于其各自在整体中的特殊性得到了充分尊重,进而才发挥了他们的内在因素的作用。他主张,在民族问题上,既应对多元性和特殊性给予充分的尊重,但同时也确实存在着整体的共同利益。^[15]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再次提出要从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来看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变动。与此同时,他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多民族关系格局中民族融合的各种不同程度以及融而未合的很多现象。他认为,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不应该局限于某一个民族,不应该局限在某一个省,也不应局限在某一个学科,而是要有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和大视野,需要联合考古、语言、历史、体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综合研究以解决有关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解释中国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如何运动的,进而也才可以澄清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18]

费孝通注重族别研究,他注意到由于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民族学研究中强烈的“族体”意识所产生的研究范式存在着一些问题。他指出,把少数民族按照“族别”分别地逐一研究,在方法上固然有其长处,但也有它的局限性。他指出,中国民族的特点就是相互掺杂,如果孤立地看待一个民族的历史就不容易看出其特点。^{[13](P453-459)}他认为,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一向不是孤立的,因此,我们很难把每个民族的历史区别开来只写族别的专史。中国多民族交叉杂处,历史也彼此无法分割,如若硬是要分,结果是越分越乱。在中国的很多民族走廊,民族来来去去、分分合合,历史上的民族你变成我,我变成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而未化的现象很多。所以,不要把民族看死了。从学科的发展来讲,后来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的民族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对中国民族学过于偏重少数民族族别研究这一局限性倾向的纠正。^[19]在《甘南篇》中,他超越了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提出了陇西民族走廊的多民族关系以及

藏族“也和汉族一样,是个在历史过程中融合了许多不同成分的民族统一体”。^{[20](P71)}

至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呼之欲出。他在1988年8月,写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并于11月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讲演,他在这次讲演中全面地论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多元起源、复杂的历史形成过程、“多元”和“一体”的结构关系等,从而正式地提出了后来被学术界称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理论。

三、结 语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性意义。该理论的提出,尽管最初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尝试解决“各民族发展与国家统一”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的需要。^{[21](P29—33)}但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很好地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多元”和“一体”的问题,对中华民族从何处来,如何来,将到何处去这样宏大的问题,作了清晰的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是中国民族学理论、民族史研究和实践面临的重要课题,也进一步解决了当代中国各民族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为当今世界各多民族国家解决面临的主要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当然,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它与时俱进地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4).
 [2]费孝通.关于人类学在中国[J].社会学研究,1994(2).
 [3]杨继顺.费孝通早期社会学思想初探[J].彝族文化,2009(1).
 [4](法)迪尔凯姆著,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

[5]丁元竹.费孝通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6]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7]张冠生.费孝通传[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
 [8]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9]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2.
 [10]高翠莲.试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阶段划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
 [11]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增订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2]孙进己.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J].史学集刊,2001(3).
 [13]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上卷)[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4]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15]周星.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理论[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2).
 [16]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17]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18]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
 [19]陈连开.中国民族研究的识异与求同[J].社会科学战线,1995(4).
 [20]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下卷)[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21]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顾祖成]

[校 对 夏 阳]